我的纪行文写作缘起

向那些好好走路，好好码字，好好码走路的字的前辈们致敬。

徐 坚

和列维-施特劳斯一样，我讨厌旅游，我讨厌旅行家。无论是旅游，还是升级换代的旅行，如果它的价值就是用“另一个世界”去印证、填补或者比对“自身拖着的世界”，无论是睁着眼睛艳羡，还是闭着眼睛满足，这样的“异域”经验都是无聊的。

我喜欢前辈们将有趣的“异域”经验称为“行脚”，或者干脆称为“走路”。熊野古道上，前往高野山朝拜弘法大师本院的信众们执杖穿行，走的是无数信众曾经丈量过的同一条路，看的是千年不变的同一段景，本已是将心比心地揣摩未曾谋面的历史同行者的绝佳时机，但更妙的是，默默前行的信众们常常披着法衣，背书“同行二人”。何谓“同行二人”？谁和你同行？即使熊野道上熙熙攘攘，和你同行的只有沉睡在奥之院千尺地下，等待弥勒降生的空海大师。——这是何等曼妙的经验！

路不好走，好不容易走好的路更不好写。一本教你像模像样，或者人模狗样走路的书当然有市场，但是，如果双叟咖啡馆列入不得不去的名单，它就不再是那个可以无所事事地调情或者畅谈革命的去处了。上海进贤路上，无论是海金滋还是茂兰，越来越多的人手捧攻略挤进来，而不是为了那一口浓油赤酱的味道时，我才发现，一路下来，长乐路上那家能在凄风苦雨里调出温暖朱古力的店才是最值得怀念的。

走路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走的半径越来越大，走路越来越便利，成本越来越低，那还需要走路的字儿吗？

讨厌旅游的列维-施特劳斯写了一本《忧郁的热带》，光是个日出，就生生写了 4 页！龚古尔奖用拒绝颁奖的方式高度褒扬了这本书：本奖如果不是只颁给虚构文学作品，那就毫无悬念啦！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列维-施特劳斯的文学才华，但是，能顺利说出回字的四种写法的我们也能码出不同凡响的走路的字。按照我最喜欢的学者之一——鸟居龙藏的说法，我将这类文字称为“纪行文”。鸟居龙藏等前辈用写作反复说明：不是所有的走路码出的字都叫纪行文。

“纪行文”是日本学者最擅长的文体，而且，中国一直是纪行文中最主要的内容。不管是喜是厌，是嫉是畏，还是爱恨交加，日本人对中国格外关注。自 1871 年建交以来，日本在短短两年内就在上海、福州、香港、厦门和北京开办了领事馆和公使馆，前来中国的人如过江之鲫。访华人士或者是接受政经资助，必须成文汇报，如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和《中国漫游记》，更成规模的是东亚同文书院，每年夏季皆有毕业生组团调查不同省份，到 1920 年时，竟然集结出版了《中国省别全志》；有的则受报章派遣，发回前线报导，如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东洋文库收集的明治以降的中国游记达到 400 余种之多。由于身体原因不宜远足，但是骄傲到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日本汉学巨擘桑原骘藏在 1907-1908 年进行了一辈子唯一一次长途旅行，从西安到山东，从蒙古到南京，《考史游记》是桑原骘藏此行的结果。

我心目中的纪行文榜样出自专业兴趣和我相仿的几位前辈学者。毫无疑问，行走一辈子，也码字一辈子的特立独行的鸟居龙藏占据了首位。1895 年，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前往辽东半岛，鸟居龙藏开启了一辈子的行走。时年 25 岁，还是东京大学理学部助理的鸟居龙藏意识到自己是第一个系统调查辽东半岛的日本学者，而且还将创造更多的第一记录；他不仅需要好好走路，更需要好好记录下走过的路。因此，鸟居龙藏既写严肃的调查报告，如《苗族调查报告》和《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也写轻松隽永，不失学者智慧的纪行文，比如，历年在蒙古的行走就催生了《蒙古旅行》(1911)、《满蒙探查》(1928)和《满蒙再探查》(1932)三本纪行文。鸟居龙藏的行走起于辽东半岛，遍及从西伯利亚到西南中国的广袤土地，终止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1951 年重返日本时，鸟居龙藏以一本《老学徒手记》总结了一辈子走过的路。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

开启日本考古学的巨匠滨田耕作也是记录有学术力度和思想热度的行走的高手。由于身份敏感，政局微妙，滨田耕作在朝鲜，台湾、辽东半岛乃至北京的历次行程都没有形成学术之外的文字，所有的文学才情都集中倾泻在《南欧游记》和《希腊纪行》上。

如果不算求学时代，我的学术行走起始于 2001 年开始的韩江考古之旅，随后是持续至今的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各类调查。穿插其间，我也会为特别的材料，特别的课题访问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学、博物馆和收藏家。我喜欢自苍山访碑或者海边游神归来，夏日屋顶啤酒、冬日小巷黄酒的时光，也喜欢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旧院里，管理员告知“一份一百年来一直等待读者的材料马上送到”时的晕眩。站在谢阁兰 1914 年访问并引发纠纷的广元曲回坝汉墓上，我深感有必要为他洗刷不白之冤；而在会安城内，从各种导游的套话，对“文化遗产”的盲目鼓吹以及想当然的历史研究中逃脱出来，发现一段从未被人提及的历史，又多么令人产生记录下来的冲动。每到这时，我总是对那些好好走路，好好码字，好好码走路的字的前辈们心怀敬意。

对，这是我的纪行文的写作缘起。既然都已经好好走了那么多路，为啥不好好地把走过的路码出来呢？ （作者为历史学系教授）

致母亲

仅以此文，献给世界上最伟大的也是最脆弱的，我的母亲。我爱她，并且深深地思念着她。

闫 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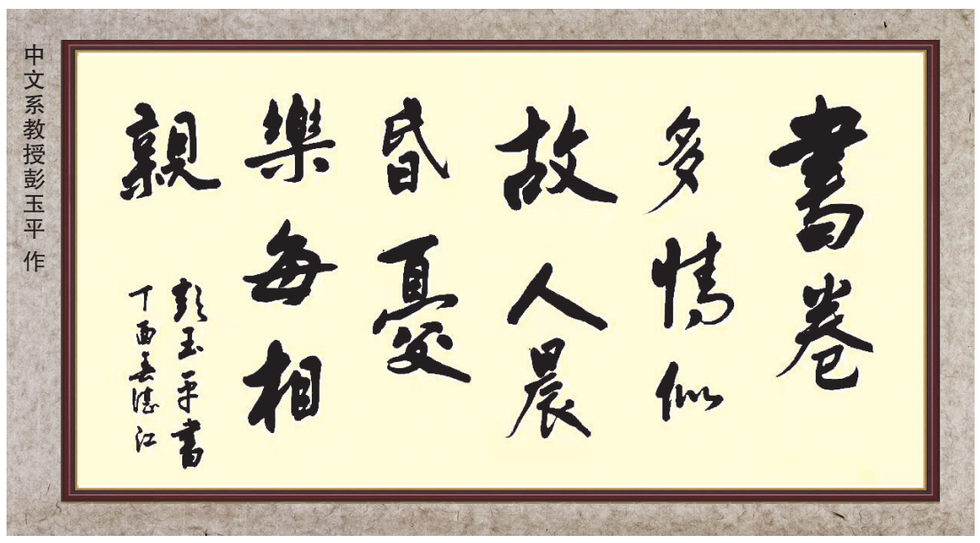
在朝气蓬勃青春洋溢的她面前，她对时光流逝的无可挽留是显而易见的。她从不舍得给自己花钱，护肤品少得可怜，更别提化妆了。她缝补着岁月的创口，衣柜里塞着的满是过时的陈年旧物，被她嘲笑嫌弃时就只是一直笑，没有一句言语。

她答应过她要对自己好一点，三餐按时吃好，每天一个苹果，少吃甜食，多吃蔬菜，常备鱼肉，忌生冷，忌油腻，不熬夜，多运动，别为工作挣钱不顾自己身体，别做轻易为别人加班到昏天黑地的烂好人。但她一样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时常酸痛的肩膀，若隐若现的黑眼圈，疲惫的双眼中充斥的红血丝，电脑旁堆积如山的文案，还有早已被遗忘在柜子角落的运动鞋。她完全可以想象她每天的生活：早晨空着肚子去单位上班，却跟她说自己灌了一肚子的豆浆油条，好不满足。吸了一上午的电脑辐射，因久坐而导致腰酸背痛，浑身乏力，却为了省钱强撑着自己回家做饭。中午她从冰箱里拿出已经打蔫了的蔬菜，草草地给自己煮一碗清汤素面，却得意洋洋地跟她汇报和公司几个姐妹出去吃的大餐，有鱼有肉，还有她最爱的红葡萄酒。晚上夜深人静时，她百无聊赖地掏出手机，望着微信上的名字盯了许久，手指来来回回在屏幕上摩挲，想触碰又缩回了手，直到“叮”的一声，她的消息传来，她才稍稍安顿下又悬了一天的心，然后估摸着时间装作漫不经心地回道：“我正和你爸逛超市呢，买了一大堆好吃的，是啊，这几天可忙了。”

其实她一直都知道她内心的脆弱，自她离家在外独自求学后，她的脾气日益温软，再无半点疾言厉色，对她的要求从来都是有求必应没有丝毫犹豫，她不顾一切地消费着自己的身体拼命赚钱只为她能在远方过得更好一点不要委屈。她用尽全力伪装出一个坚强的若无其事的外表，小心翼翼地压回满得都要溢出的思念，尽量保持体面，怕被戳穿。其实她又何尝不是呢？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她不止一次地责问自己，怎么就忍心隔着大半个中国的距离丢下她？她常在外人面前没心没肺地笑，也总自我标榜为坚硬刚强的女汉子，却终是熬不过日日夜夜的相思之苦，在看到有关家的文章视频时不争气地掉下泪来。她自知现在羽翼尚未丰满，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接过她的重担，撑起护庇家人的责任，所以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快快变强快快茁壮，一定要让自己成长的速度远快于她衰老的速度，一定要每一秒都比上一秒更爱她更关怀她。她把自己的软弱无奈委屈颓废通通打包扔掉，她下定决心抛开懒癌手癌拖延症等一切弱者的借口，她要成为顶天立地的巨人，为她遮挡所有的风霜雨雪，揽过她日趋瘦弱的肩膀。

她今年十九岁，而她已经四十五了。她从来都没有对她讲过，她长于她的许多生命，这么多年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时间的大手撕扯着，却始终保持沉默。她在岁月面前点滴的苍老都使她心惊。此刻，她独自坐在宿舍，窗外雨声淅沥，她多想穿越那重重阻隔的万水千山，回到她的身边，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轻抚她脸上细碎的皱纹，摸摸她肚子上可爱的赘肉，对她说一句，我好想你。

（作者为中文系（珠海）2016 级本科生）



中文系教授彭玉平 作

有别于人间四月的更美春天

陈 慧

四月的岭南，慢步走在强弩之末的春风里，被一片黄叶敲打眉心，抬眼却是漫天新绿。那是大叶榕枝干上最后的黄叶，它掠走我的思绪，失落在温润的泥土中。恰好这时候，我的一位学生在朋友圈敲下了 T.S.艾略特的诗：“四月最残忍，从荒地里长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又用春雨唤醒迟钝的根芽。”在同个校园，或许她也经过了春日里的落叶与繁花，而后在艾略特的诗中获得共鸣。

诗词格律课的第一节课，我便提醒学生：我们时常会在诗意的世界里形成某种默契，而这样的默契在现代社会的匆匆行走中时常被忽略，留待有心人重新发现与捕捉。这里的“我们”，包括我与天地间的一草一木，我与生命里的某人某事。甚至于，可能包括我与诗词中的妙语妙境——在前年一次课上，我正讲到李商隐，学生们忽然惊呼，只见一只青色蝴蝶飘然而至，蹁跹在屏幕上的诗行之间。千百年来，诗人们捕捉了太多这样美好的默契，并让愿意沉静下来慢读欣赏的读者惊诧于它们的奇妙，感慨于刹那间生起而又包蕴无限的沉思与深情。

我总是希望学生先努力成为这样的读者，通过对经典诗词的阅读，重新感知与自我、他人，与社会、自然，与当下、古典的潜在联系，寻找灵犀一点相引相通的那些瞬间。虽然现代人的生存体验、生活方式都已去古太远，古典诗词的世界之于大多数学生已无异于荒原。但正如四月的丁香总是从荒地里长出，古典诗词的曾经枯萎与死去倒也成就了沃土。我始终相信，学生若有心在此处播下欲望，定将与文化血脉渐渐交融，而在某次春雨的召唤下长出纯净的根苗。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不也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同在四月，人间芳菲尽逝，山寺桃花始开——如果“人间”是现代人所处的当下，那么“山寺”就像大多数人已然疏离的古典世界，恰因处在人迹罕至的高寒幽深之处，而留存一片有别于人间四月的更美的春天。若非因为诗人的那份痴念与执着，如何在空间转换中获得春天的延续与新生？

当然，不论是荒地上倏然破土的根苗，还是山寺中翛然绽放的桃花，都离不开此前的连绵春雨。这意味着，古典诗词的教育应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始终在想：如何让学生开始敏感的心灵纯净无邪，如何引导这样的心灵安放于更高处的春天？“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已为后世的诗词教育规定了基本方向。但要怎样去呈现古典诗词中的“温柔敦厚”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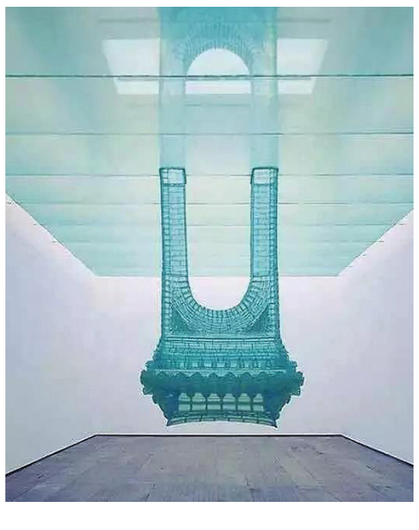
讲解诗词之前要知人论世，陈寅恪主张“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便指对古人先存一份温厚，我总是尽可能去发掘古典诗人的人格魅力。据李肇《国史补》载，韩愈登华山而哭。有人讥讽他好奇太过，怯懦有余。但结合正史，学生会质疑，这样一个谏迎佛骨时“肯将衰朽惜残年”，宣慰叛军时“勇夺三军之帅”的人物，会登华山而哭吗？我便进一步让他们思考：若真有此事，韩愈是因怯懦而哭，还是像孔子悲麟、墨翟泣丝、杨朱泣于歧路、阮籍哭于穷途那样，有着更深远的忧患？有时，学生会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对古人的重新认识：“‘君子居其位，则思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道不行于时世，不得已而为之。’韩愈你原来是这么了不起的人！”有时我会突然收到短信说：毕业后比较波折，想起老师课上讲过的柳宗元，“少年得志的贬谪可能在心理上更受折磨，但这样还是可以造福一方。只要知道自己可以做出或多或少的贡献，好像眼前的得失都不算什么。”每每此时就觉得特别欣慰——哪怕黄叶铺天盖地，学生愿顺着我所指的方向抬头望，愿将发现的新绿存在内心继续前行。

讲解诗词亦复如是，尤其是讲怨诗。“诗可以怨”，怨情最能动人，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感动于“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的拳拳温厚之意。我先以诗史互证法分析“怨”从何来，并据儒家义理指出“怨”的正义性——若是私怨，恐无法成为经典作品。而后发问：诗人为何如此写“怨”？比如，老杜为何说“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我们知道，杜甫是在任左拾遗时因上疏救房琯一事为肃宗所恶，遭致贬官且不再受重用的。但他却归咎于自己的“老病”，且在另首诗中自比幽居空谷的佳人，哪怕丈夫喜新厌旧抛弃她，仍然自守清节，眷念故情，“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默默等候再会。再如近代龚自珍的“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黄侃的“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即便在山河、自我飘零之时，仍以强大内心面对苦难，怀抱对上天、对他人的感恩。

可以说，在温柔敦厚中，始终激扬着一股清健之气。我想，正因如此，丁香的根苗、山寺的桃花，才能始终顽强地植根、绽放于世俗人间的腐朽与残缺之上吧。 （作者为博雅学院讲师）

阁楼的诗学

蔡 典



初中的时候，因为中午午睡时间吵闹，被班主任下了驱逐令，中午时间不能待在课室。然后我多次转移阵地，去过天台、饭堂这类地方，最后定居在教学楼的一个类似阁楼的地方，在这里度过午休的时光。

阁楼暗暗的，有一扇门通往天台，还有一间历史老师弃置的办公室，它有一扇中国风格雕艺的烤漆大门，我从没有走近看过。阁楼有一扇不大不小的窗口，对着学校外面的马路。

夏天的时候，阳光斜斜地从那扇窗漏进阁楼，更觉得阴凉。当太阳晒得空气微颤着向上流动，楼下马路上有一两辆车经过，引擎声、轮胎摩擦地面、大妈买东西路过，声音都从那窗进来。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一边听着，一边可能还会想想放学以后的事情，或者干脆放空大脑，就这样独享一份只属于自己的时光。

一个中午，我坐在阁楼的台阶上打盹，有个同学溜进来看我。可能当时我的姿态看起来很可怜吧，那个同学用一种带着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这让我不禁想知道，在外人看来，阁楼会是怎样的地方呢？

契诃夫在他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里曾描绘男主如何爱慕着夜色笼罩的阁楼里那个少女：

“我犹豫地站了片刻，然后缓步走回去，想再看一眼她居住的那栋可爱、朴素、古老的房子，它那阁楼上的两扇窗子，像眼睛似地望着我，似乎什么都知道了。我走过凉台，在网球场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我在老榆树的荫影中，从那里瞧着房子。只见蜜修斯住的阁楼上，窗子亮了一下，随后漾出柔和的绿光——这是因为灯上罩着罩子。人影摇曳……我的内心充溢着柔情和恬静，我满意自己，满意我还能够有所眷恋，能够爱人。”

“阁楼上的光”，当我们想起这样的画面，心底就会泛起点点温柔。在作家那里，阁楼变成了一个甜蜜的向往，一种爱慕却因为它在房子的最顶层而有着无法得到的苦涩。在这里，阁楼变成了梦想。

事实上，没有人能真正拥有阁楼，它是整栋房子里唯一被驱逐的地方，唯一以排除的方式纳入的地方。即便是“阁楼土著”如我，也未必真正拥有这个名为阁楼的地方。不是说在房产权意义上，而是说，连同那在被驱逐以后，我所追求的一切，比如自由，未能在这个让我安定下来的地方得到实现。

我会感到不自在。不只是因为“寄人篱下”，还有一些突发情况，比如有一次有一对情侣上来了，又比如偶尔能听到阁楼下面有人走过。但更根本的是，我很少能真正摆脱平时的烦恼，哪怕是在这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

一方面我企图追求那种让人安心的孤独，另一方面，当我真的孤单下来的时候，却未必感到安心。

许多年后，当我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阁楼才以纯粹能指的形式，向我揭示在生命的散文中，这段经历具有的内涵。面对未曾企及的诱惑，真正的自由不意味着纵欲，也不意味着康德式地将某个行事普遍化，而首先要承认，那诱惑着我们的 object petita 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触及的。

而今我回忆起这段往事，心中仍然充满向往，尽管已经不大有机会能够像那样，占领一间空屋，划出仅属于自己的地方。想起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曾这样描绘阁楼：

“所有曾经的独处空间，我们曾忍受孤独、享受孤独、渴望孤独、接受孤独的空间在我们心中都是无法磨灭的。……当我们失去了屋顶上的小阁楼时，永远不变的是我们曾经喜爱过的一个阁楼，我们曾经在一个屋顶上的小阁楼生活过。我们在深夜的梦幻中回到那里。这些不起眼的小屋有着壳的价值。……以前我们可能觉得阁楼太狭小，觉得它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而现在，在通过梦想而重新找回的回忆中，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何种混合的学说，阁楼既小又大，既冷有热，永远给人安慰。”

（作者为哲学系 2015 级本科生）

本报编辑：徐津阳 卢旖维　编辑部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南校区大钟楼三楼　电话、传真：84111991　邮编：510275　承印：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